



【泰山精神】

易君左和他的“中华国山梦”（下）

□周郅

历代推崇的泰山封禅祭祀活动，一方面出于封建帝王宣扬君权神授、夸示文治武功的目的，同时也不无崇尚自然、遵循天道的寓意。这种举行在泰山空间的国家礼仪，最终促成其成为主流文化所崇拜的王朝首山。虽然国体变易，封禅消亡，告祭废止，但论定泰山的文化地位，绝难忽视或回避这一国家礼典的重要作用。易君左在此问题认识上充满睿智，他一方面承认这类山岳祀典“一则纯系帝王个人之夸大狂”，“显与现代潮流逆”，同时又从中发掘出合理内核：“然泰山为吾国历代所仰重，至屈天子之尊严，代表大自然之威力。此为吾国历史上所特有之事迹，何可忽视？今若由国家定为国山，即‘泰山者，中国国民共有的山，而国民灵魂之所系者也’！其意义，亦即扫除历代封建思想之残渣，唤醒君主专制之迷梦，而复主权于国民，故定泰山为国山，可以一新吾国之历史之记录，滤清国民之灵魂。”重启泰山“国家之山”的历史记忆的同时，又弃其糟粕，扬其精华，将传统祀典赋予时代精神。同时充分吸纳世界地质学的新成果，援引美国威烈士（今译威理士）、德国李希烈士（今译李希霍芬）等人的研究，从现代科学角度，认定泰山据中国最古老之地层，系全国山脉之中坚，“是定泰山为国山，深合人文地理之真实精神”。

除此之外，易君左还从民俗学、古文字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解读泰山，提出“盖吾国国民数千年来，所拥戴之一大自然现象，厥为泰山。社会生活，心理信仰，咸系于此。故定泰山为国山，正见中国民生主义精神”，并最后对泰山的文化地位予以论定：“泰山者，中国民族历史之活的典型也……一入泰山，即不管翻阅吾民族之光荣史页。”今人每标举郭沫若“泰山是中华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一语，以示泰山文化之价值，事实上，早于郭氏数十年，易君左便已作出相同的论断，足见其目光之犀利、论断之精当。

在山水审美上，易君左也别具只眼，他提出“他山虽奇，而无如泰山之奇中之奇；他山不过奇中之奇，而泰山为奇中之不奇、不奇中之奇，故天下莫与之比”这一段极具哲理思辨的议论，真切道出了泰山的美学特点。明代学者张岱观察泰山时曾指出：“泰山元气浑厚，绝不以玲珑小巧示人”（《岱志》），“阳明无洞壑，深厚去峰峦”（《泰山》），其论已触及到泰山山水的特异之处。与之相比，易君左所云“奇中之不奇，不奇中之奇”，更深刻把握了泰山“中和之美”的哲理内蕴。其语使人联想起明人项穆《书法雅言》之论书家中和：“圆而且方，方而复圆；正能含奇，奇不失正；会于中和，斯为美善。”可谓思理相通。这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作者所揭出的泰山“中正刚健”之四大德性。而这种他山所不具有的“中和之美”，也正是泰山得以问鼎国山的重要条件和特质。

基于以上一系列论证，易君左认定泰山正是中华国山的唯一“山选”：“吾国山岭纵横，博大雄伟，为全球冠，顾或因地域辽阔，或因与史无关，或因徒拥虚名，或因缺乏景物，求能气魄伟大，形态庄严，傲首嶙峋，丰姿华灿，而又与吾国历史文化及固有道德有密切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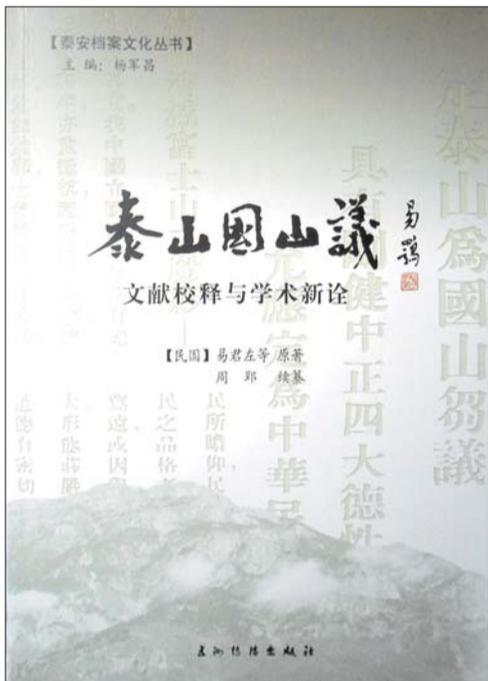
远之关系，且确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者，舍泰山而外，将何所求！泰山者，决非山东一省之泰山，而为全中国之泰山……国民心目中所仰为至高无上之巍峨象征者也。故定泰山为中华民国国山，其理由至为光明正大！”

在列举国山理由之后，易君左高屋建瓴，对今后的泰山建设作了一番前瞻与畅想。近代百年巨变，新文化、新思潮、新观念风生水起，许多学者对泰山建设也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思考与创议——如置管理局、架设索道、建博物院、设泰山大学、在泰山下建中华新都等，无不具有超前眼光。其中易君左所提建设之议最具新意。如其关于“文化特区”的构想：“于统一的文化中，特别应注重实施民族主义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发扬光大中国的民族精神，使文化之向上，一方面使中国之民族精神普及于全国国民……然必谋一文化集中之法，使某地成一文化区域，为全国观仰，以资典范，则定国山区域为全国文化中心，最为适宜……国山区域，为崭新的文化图案，又系文化最古之乡邦，渊源有自，富有资格为全国文化之核心。夫南京为吾国首都，首都者，各项核心中之核心也，至于文化中心，自应定之于国山区域。”提出了中国

于行政中心之外，应另外置一文化中心的大问题。这一提议对中华文化的挖掘提升、民族精神的提炼凝聚及传统文明的梳理整合，都具有积极意义。21世纪之初，著名历史学家葛剑雄提议中国应建设“文化副都”，其实质与易君左不谋而合。

需要指出的是，易君左提出的“国山之议”，还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当《定泰山为国山议》奋笔疾书之时，正值“九一八”、“一·二八”战火相继燃起，国人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之际。在这种时局下，此番东临泰岱，易君左“登山以长啸，招国魂其何方？海东浪浪，塞北愁云，益令人悲歌慷慨而不已”，所谓“北望关山未解忧”（《上山道中》）！故拟借议定国山，维民族精神于不堕，激励国人抵御外来侵略之斗志。易君左在文章引题中直书“用泰山的精神消灭富士山之魔影”，已明确揭示了本篇所寓的抗日主旨。在文章中，更是击起大吕洪钟，警示世人：“泰山虽似偏近东隅，然须知今日中国最大之外患，即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泰山至今已变为吾国东防之壁垒，定泰山为国山，正所以表示抗日救国之坚实意志！且泰山位居鲁省……惟今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已视山东为南满第二，山东形势之转变，关系吾国全局之存亡，定泰山为国山，正所以集中国民之注意力，以图复兴，使倭寇不敢正视而放肆。”在首节结语中，

作者以日本之富士山为比照，形象地展示了泰山所蕴含的无限生机：“吾人欲请定泰山为国山，其主旨，除欲发扬光大伟大的中国民族精神而与万国光明磊落相见而促人类亲和及世界大同外，尚有一严重的意义，即范铸‘抗日救国’之全副模型也。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富士山为国山，因而号召其所谓‘大和魂’以妄肆侵略而不顾。富士山虽有一万二千三百九十一呎高，然其山巅终年积雪，如白头翁，为民族已衰老之象征，又为火山之遗体，是大和民族已为残骸，又其山土石杂陈，已不纯粹。泰山则不然，‘观日’为泰山上之壮举，可以畅吸宇宙之朝气，满山飞瀑如练，象征中华民族活泼泼的精神，全山皆为石



山，岩石巍巍，极有骨格，苍松翠柏，最能耐寒，挺秀千古，非如富士之不毛也。”以岩若泰山之气象感奋国人，昂扬斗志，可谓用心良苦。

泰山作为历史上“配天作镇”、“与国咸宁”（泰山石刻语）的王朝首山，经过易君左的提炼升华，将其置于时代激流的浪巅，使之充任能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并激励人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象征物。从这个角度来说，《定泰山为国山议》堪称一篇激荡人心的泰山颂、一卷正义词严的抗日檄、一首振聋发聩的正气歌！

正是：壮怀风雨寄名山，泰岱雄文首此篇。一代岳宗谁论定，国魂万古莽苍间！

（本文作者为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未了”。

朋友曾寄给我一批书，其中一本是《另一种乡愁》（三联书店，2004）。开始时没有在意，可是后来不时地随手翻一篇又一篇，该书慢慢地变成了我一个不离不弃的好朋友。因为这个作者带着慈悲的温柔的文字，让人读出那么一个可爱的老头儿来。每次翻翻，都好像在与此这个老头儿会心地聊天。这个老头就是瑞典人马悦然，也有人叫他“马洋人儿”，世界知名汉学家。

马悦然1948年到1950年在四川研究地方方言。曾在峨眉山下脚下的报国寺学习，老和尚果玲是他的老师。有次他去听能海法师讲法，而果玲说：“那个人

【名家印象】

可爱的瑞典老头儿

□陈心想

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屠户！”可是马悦然没有听老师的话，还是去了，而且亲自感受到了“能海法师内在的精神力量是不需要语言来表达的”。我从万年寺回报报国寺之后，老和尚果玲有两个星期不理我。”马悦然文章结尾的这句话，很好玩，是委屈，是抱怨，还是什么？不知道，只觉得这句话读来很可爱。

在报国寺的时候，他跟几个小和尚处得很好。有时候他会到五公里外的地方买东西，每次都顺便给庙里的五个小和尚买炼乳。因为他看到小和尚们在长身体，怕营养不够。其中四个小和尚都当面向他道了谢，只有一个拿着炼乳到七佛殿去，回来碗是空的，递给他并说“谢谢”。后来他发现，原来这个小和尚每次都把炼乳倒在七佛殿的水沟里，因为“他不愿意让我知道他最不喜欢的是炼乳”。可是，马悦然没有生气和责备，依旧每次给这个小和尚炼乳，“让他供养七佛，多买福田”。

在“谈后悔”一篇里，他谈到了最后悔的一件事。在澳洲内地，一天晚上在一个酒吧喝啤酒，一个澳洲原住民来买一瓶酒，那时原住民不准买酒，那人就把酒放在了大衣口袋里。可惜口袋裂开了，瓶子掉在水泥地上碎了。那个原住民很失望。马悦然所说“常常想起使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这件事。他写道：“我这个愚蠢的瑞典人当时没有想到给那真可怜的人买一瓶酒！到现在我真的为这件事伤心。”

他谈到生命历程里出现的几次“永久的刹那”的感觉，是一种“感到时间停止了，或者浓缩成一种包括‘一’的一切的刹那”那种审美的经验。他说也许类似于禅宗的“觉悟”。一次，他在纽约出席座谈会，居住的旅馆门口之外，每天晚上睡着一个年轻的乞丐。一天晚上，马悦然在一家中国饭馆买了几个菜和一罐啤酒给了他。当乞丐说“谢谢”的时候，两人眼光霎时间正相视，出现了一种感觉，跟他22岁时曾经在电车上看到一个美丽的姑娘一样：“我霎时间感觉到我的眼光穿进她的心里，她的眼光也穿进我的心里；我忽然懂得我们两个不仅是一体，我们好像跟四海之内，跟全宇宙的一切众生都成为一体。这绝不是一见倾心的感觉，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可是与情欲的满足毫无关系的快感。”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美感体验，而“美是真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于是，“我现在的研究目的是寻找那种真理之美，满足自己的兴趣。我很可能是一个非常自私的老头儿”。那么慈悲施舍，还说自己因为追求真理之美以满足自己的兴趣，很可能是个非常自私的老头儿。你见过几个这样的老头儿？当我读到这里，总觉得这是当慈悲心遇到了感恩的心，那种人性光辉的闪现。

看他描述当年在香港等未婚妻陈宁祖时的情景。他每天清早坐火车到罗湖去等宁祖，那里啥都没有，只能空肚子等，“桥两边的兵当然懂得我在等人。每有一个漂亮的姑娘过桥的时候，他们指着向我吹口哨儿。我只能摇头。宁祖比她们漂亮得多！”

当马悦然1950年不得不离开中国内地时，转道香港回去。在“旅途之二三事”一文结束说：“人到了香港，箱子也到了香港。可是我的心呢？我的心在哪儿？”多情的年轻的小马，因为两年的中国生活，中国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一生在翻译、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他翻译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包括很难翻译的《水浒传》和《西游记》等。他说，“我翻译《水浒传》的过程中，我真的生活在梁山泊英雄中：鲁智深、武松和杨志都是我的好友。”难怪他在离开中国时，会问：“心在哪儿？”他的这一问，更显示了他是个可爱的“多情种子”。

这本《另一种乡愁》确实饱含了作者对一种特别故乡的思念。李锐的序言题目是“心上的秋天”，也正是马悦然这个“多愁善感的慈悲心”，更让人觉出他的可爱来。

（本文作者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供职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